

# “我的大学”

## ——回忆我在关东学院大学的岁月

葛涛

在此借用高尔基的一个题目，将自己的留学心得、见闻整理出来，与诸君共享。

### 一 校园三景

“金泽八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首府横滨市的金泽区，我的母校关东学院大学（Kanto Gakuin University）即坐落于此。我从1992年4月起进入该校经济学部第一部经济学科学习，在此度过了4年的光阴。

金泽区地处横滨市东南端，东临大海，南与横须贺港及横须贺美军基地相邻。海滩景色优美，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其中有一个名为“八景岛”的景区，更是风光旖旎。当地人推而广之，约定俗成地将“八景岛”及周边地区称为“金泽八景”。关东学院大学的三处校区都在横滨市内，彼此相距不远，其中最大和最主要的即“金泽八景”校区，校园内有代表学校特色的三大景观。

我每次去学校时，总是先从横滨西口乘坐暗红色车身的“京滨急行”快车，约30分钟到达“金泽八景”站，出站后再步行15分钟左右方能到学校。学校大门前蜿蜒着一条景观河道，通向大海，河水很洁净。平时河里泊满了私家游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河面泛着粼粼微波，白色的游艇分外耀眼，成为关东学院的第一景。在我就读的那几年里，这幅画面曾被选用为学校宣传画册的封面。

进入大门，第二景随即映入眼帘，那就是关东学院大学的标志——正面嵌有十字架的蓝灰色尖顶教堂。作为日本为数不多的教会大学，关东学院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84年美国基督教浸礼教派传教协会在横滨山手创立的横滨浸礼派神学校。二次大战后的1949年，这座几经沧桑的基督教神学校改组、升格为私立关东学院大学。起初校方颇有将其建成日本浸礼教派高等教育重镇的雄心，所以有意识地在教学中设置了一些神学科目。可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办学理念背离了战后崇尚务实与世俗化的社会风潮，结果好景不长，校方从60年代以后不得不再压缩神学教学，并最终于1970年取消了所有的神学课程。

虽然神学从讲坛上消失了，但教会依然在校园生活中保有一席之地，教堂便是主要的活动舞台。驻堂牧师不顾参加者寥寥，坚持每周举行礼拜；教堂拥有一架值得骄傲的管风琴，还组织了唱诗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教堂里传出赞美诗的吟唱与管风琴的乐声，优雅悦耳；此外，每年圣诞节来临之际，教堂门前总会高高地矗立着一棵装扮得流光溢彩的圣诞树，傍晚时分，树上犹如繁星点点，而此时唱诗班正在加紧排练，歌声不时从教堂内飘逸而出。上完最后一节课，步出教室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每每感到既宽慰又心酸。在孤寂中感受节日气氛，自是感到慰藉；而对如此“良辰美景”却只能投以匆匆数瞥，就不得不急急地赶去打工，这又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关东学院的第三道景观则是由一群生龙活虎的棒小伙子演绎的，这就是闻名全日本的校橄榄球队。校队在每年的全日本大学橄榄球联赛中基本上都能稳进三甲，甚至夺冠。论橄榄球的实力，关东学院人可从来都不把早稻田、庆应等名校放在眼里，要是不服，那就比比试试吧。每一位球队队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校园明星，上至校长、下至普通学生，都对他们另

眼相看。每当他们“全身披挂”出现在操场上时，总会引起长时间的围观。有一位师兄曾醋溜溜地对我说：平时在学校看不到几个美女，可一到校队比赛时，放眼观众席上，关东美女可尽收眼底矣。我听了只是笑笑，心里却想：关东学院哪有什么美女。倒不是我心存偏见，只是本校女同学基本上都是横滨本地的小家碧玉，温婉贤淑，平平淡淡，无论举止、装扮都不张扬，这样的女生给人的感觉似乎千人一面。那位师兄是地道的横滨人，日本人称为“滨子”，我想他看横滨女性的眼光应该比我准吧。

关东学院大学的橄榄球队最初由美国人一手操持，颇得一些美式打法的真传，它能多年保持佳绩的最大秘诀即在于此。虽然我对橄榄球并无特殊兴趣，但每次看到校队在联赛中披荆斩棘，还是感到由衷地骄傲。

## 二 感受自治

日本在战后实行地方自治，国民的自治精神和意识都比较自觉。我读大学期间，恰逢东京都和大阪府进行知事选举，结果两位著名笑星胜出。两人都是独立参选，都没有从政经历，都靠地方选民的支持才得以当选。由此可见日本社会自治已经相当成熟。说这些题外话的目的在于阐明日本社会的自治背景，否则大家就会对关东学院大学是一个自治单位感到不可思议。

日本的大学分为国立、公立、私立三种。顾名思义，国立是由国家、公立是由地方公共团体、私立则是由民间的学校法人兴办的。关东学院大学的学校法人是关东学院。日本《学校教育法》、《私立学校法》规定：私立大学接受文部科学省管辖，后者根据相关法律裁定学校法人的资格、决定是否设立私立大学、批准私立大学新设或撤废学科、学位点的请求等。

但官方对私立大学的介入到此为止。学校的日常管理由校长负总责，重大事项则必须经由教授会通过。校长虽由学校法人任命，但听命于教授会。这种关系由法律加以确立，私立大学实质上是一个按照教授会意志进行管理的自治体。

自治状态下的校园生活自有其特色，比如对于大多数关东学院大学的学生而言，来自文部大臣的两封贺信就是在学期间收到的全部官方信息。这两封信相隔4年，前一封致全体新生，后一封致全体毕业生，分别在入学、毕业典礼上由主持人宣读。

在中国学生看来，或许这件事最不可思议：大多数在校学生不认识校长。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私立大学校长虽然是学校管理的总负责人，却不是学生的领导和精神领袖，双方没有刻意接触的必要性。一般学生见到校长的机会是两次，分别在入学与毕业典礼上。即便在这种场合，校长致辞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0分钟，不过应景、完成一道程序罢了。

学生与教授的关系恰成对照。学生但凡想毕业，不和教授打交道是不行的。即便能够应付所有的课程，最后毕业论文还是要过指导教授这一关。但学生在这种双边关系中是掌握主动的一方，因为他有选择教授的权利。学生自行选择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然而一旦关系确立，就不得无故更改了。如果态度轻率，则很有可能日后自食苦果。例如到了大四时，整天为求职而疲于奔命，此时如果指导教授特别“关照”，将毕业论文数次退回要求修改，学生就会苦不堪言。因此为了选择一位合适的指导教授，学生大都在事前认真做了功课，多方打听本系教授的学问、性格、经历等。

教授给学生上课、解惑，而学籍管理则由学校管理部门的学生课承担，它依据学籍条例进行管理。学生如果出现不按时缴纳学费、无故长期旷课、缺考、考试作弊、成绩不达标毕业标准等情况时，学生课就会出面与学生本人及其担保人沟通，协商解决办法。处分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使用。

宽松的管理、并不沉重的学业，使大学生们优游自在，处处显得游刃有余。为了多交朋

友，更好地打发课余时间，学生们组织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社团。一个日本学生如果不加入社团，就意味着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对于大多数社团而言，加入者多多益善，但一般公开在校内张贴募集启事的并不多，因为这有点失面子。比较多见的是在每年新生入学之际，各社团派出自己的帅哥美女，看见新生模样的就主动上前搭话，劝学弟学妹们加入本社团。新生们对这些师兄师姐也很欢迎，因为几天下来，就算一个社团也不加入，也会通过这种对话了解不少学校的情况，认识一些人。共同的兴趣爱好是维系社团成员之间的纽带，许多学生在社团内找到了友谊和爱情。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社团与校方不存在任何管理上的关系，是学生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

有人或许会问：大学校园实行自治，会不会导致秩序发生紊乱？对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关东学院大学的在校生共有一万一千余人，其中我所在的金泽八景校区就有约八千名。说来也奇怪，从入学到毕业，除了大门口的几个门卫之外，我从未在校园内见到过一个保安，也从未听说校内发生过偷盗及其他刑事案件。1995年奥姆真理教事发后，据说工学部有一位研究生是该教信徒，受到了牵连。一时众口相传，沸沸扬扬，但后来却也不见下文。

除了治安状况良好外，教学秩序正常，对师道尊严更是维护有加，我在这方面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大一时我选修了文学，先生上课时非常投入，声情并茂。大概是因为沉浸于自己所讲授的内容吧，先生喜欢边走边讲。选修文学的人不多，所以在一间小教室上课，如果先生老是晃来晃去的话，学生要开小差就只能在他眼皮底下，事情就是由此而起的。有一次，先生按例边走边讲《罗生门》，正当我听得入神时，讲课声嘎然而止。抬眼望去，只见他立在教室中央，盯着不远处的一名学生，满脸愤怒。沉默片刻后，先生喝令：“拿出来！”该生虽满脸通红，却纹丝不动。于是先生只得亲自上前从课桌里拽出一本漫画，扔在他面前，喝道：你竟然在上课时看这种东西，给我滚出去。僵持数秒后，那位同学收拾起东西向门口走去，这时先生已经退回到讲台处了。我看着那对师生，觉得有点好笑，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当那位学生即将走到门口时，先生突然发话要他交出“授业票”。所谓“授业票”是一种由学校统一印制的小纸条，其实就是“点名票”。上课前由老师发下，学生填上自己的姓名、学号，课后再交还给老师。老师如果有兴致的话，可以根据收上来的“授业票”，对照着名册统计每位学生的出席率。大家都知道，先生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交出“授业票”，当然不是为了保全他的出席率，而是预示着可能会“秋后算账”，在成绩上做文章。可我看到那位同学双手呈上“授业票”，然后向先生一鞠躬，退出教室，再轻轻把门带上。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看看先生，依然余怒未消；再看看周围的日本同学，没有人显示出异样神情。为什么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我却认为不可想象？对此我想了很多。

以上只是我在留学期间对学校自治管理的一点感受，至于这种模式的优劣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三 学途琐忆

我以一名语言学校“就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志在考上大学。到日本后没多久，我就切实感受到“留学生”与“就学生”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在待遇和前途上存在着天壤之别，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尽早考上大学。

除个别情况外，日本大学的新生入学时间是每年4月，而我是1990年9月来到日本的。语言学校的签证有效期是两年，如果要考大学的话，入国管理局通常会酌情再延长半年。按照惯例，我如果顺利考取大学的话，应于1993年4月入学，在语言学校的时间为两年半。但当时我一心一意想早日进入大学，这样就必须以一年半的时间从语言学校毕业，从而将大学入学时间提前整整一年。在最终达成目的这点上我算是成功的，但也确实为此付出了高昂

的代价。事后仔细想想，如果当时自己能够沉住气多当一年“就学生”的话，起码财力能增厚许多，就能支撑着我再考几所大学，增加选择的余地。

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有关各所大学的报考信息主要从语言学校获取，其次就靠同学之间相互交流了，我就是从同学们的课间闲谈中才知道关东学院大学情况的。国立、公立大学教学质量高，收费相对低廉，报考只需参加一次留学生统一考试即可，但问题在于学校数量少，考试内容难，竞争激烈。私立大学中不乏声誉卓著的学府，如早稻田、庆应等，对入学考试的要求极为严格；但总的来说私立大学数量较多且良莠不齐，集中了二、三流的学校，因此比较容易考。然而私立大学学费高昂，并且都是单独命题考试，同时应考几所学校的话，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折腾得够呛。我经过再三权衡，觉得关东学院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还是比较好考的，况且就在横滨，考取后也不用为上学而搬家、重新找工作。

与国立、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学费要高出一倍以上。而且前者中拖欠历年学费的大有人在，但校方在学生毕业前一般都不闻不问；而后者就完全不同了，比如我们学校，只要学生在新学期开学后没有及时缴纳学费，学生课很快就会找到本人或担保人促其补缴，如果确认该生及其担保人确实无力缴付，那么学生课就会立即请他暂时停课了。对新生而言，第一年除学费外还须向学校支付一笔“入学金”，用以支付学校用于新生的额外支出。如果缴纳的数额和时间都合适，那么学校向新生征收“入学金”的做法原本无可厚非。但是许多私立大学征收的“入学金”不仅数额大、约为一学期学费的三分之二；而且时间紧，一般在发出录取通知的两周内就要求缴付，此时距开学还有两三个月，还有很多学校的入学考试尚未进行，这使拿到入学通知的学生十分为难。不按期缴纳吧，入学资格作废，这总是可惜的，况且能否通过他校的入学考试也不准；老老实实交了吧，一旦考取更中意的学校，这笔钱就算白白送人了。“入学金”就这样被许多私立大学搞成了挟制学生、确保生源的工具，颇有点像中国古代绿林好汉上山入伙时呈递的“投名状”。我在第一年总共向学校支付了 105 万日元，其中入学金 25 万日元，于 1991 年 12 月底缴纳；第一学期学费 38 万日元，于 1992 年 3 月底缴纳；第二学期学费 42 万日元，于 9 月上旬缴纳。从大二开始，入学金不用缴了，学费每年基本上还是 80 万日元。因为成绩较佳，我从大二开始一直到大四每年学费减半，外加奖学金，因此后三年等于没有缴过学费。但我心里仍然对学校愤愤不平：一是无论学费减半、还是奖学金，都来自日本政府，并非来自学校；二是在刚入学的最困难时刻，学校装聋作哑，不向留学生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日本各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从每年 12 月延续至次年 3 月，由各校单独命题，难易程度各异。其间还举行由国家出题的国立、公立大学统一入学考试。各校的留学生入学考试也在这段时间举行，依然是私立大学单独出题，国立、公立大学有统一的留学生考试。外国人报考日本的大学，一般需要先通过日语能力一级考试，否则所有的国立、公立大学及部分私立大学都不会接受报名。我是在 1991 年 12 月 7 日参加的日语能力一级考试，两个多星期后成绩公布，我才带着成绩单和其他报名材料来到关东学院报名参加留学生入学考试。我报考的是经济学部，考试科目有日语、英语，其中日语分为笔试和口试两场，英语只有笔试一场。日语笔试的内容是一篇限定最低字数的论文，口试就是回答一些常识性问题；再加上日语一级考试的成绩，考生的日语水平即可见分晓；英语考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不难。考试科目因报考学科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工学部不考英语，却考数学和物理；而报考关东学院传统优势学科——英美文学的考生却发现英语试题很难。有的名牌私立大学还要考生提供留学生统一考试的成绩，关东学院是不需要的。我们那年考生不多，考试结果 3 天后就知道了。经济学部的经济和经营学科录取人数最多，工学部的情况也还可以，其他学科就不太理想了。

入学考试通过后，就是 4 年的学习生活了。作为经济学部经济学科的学生，我需要修满 128 个学分（日语称“单位”）才能毕业。这 128 个学分可分解为 35 至 40 门课程，再加一

篇毕业论文。毕业时我的学分是 144 个，还算不错。课程分为三类：必修、选修、选择必修。日本同学的必修课包括英语和体育，留学生与之相同的只有体育，其余为日语和介绍日本国情的“日本事情”。日本学生与留学生只在必修课上有差别，其余完全相同。选修课主要是“一般教养”科目，包括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随意选择，只要攒满规定的学分就行了。选择必修课分为专业和第二外国语，其中专业课是大头。所谓“选择必修”实际上就是在小范围内选修，可因人而选，也可因课而选。比如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科学生的三大必修课之一（其余两门为经济政策、经济史），其中既有讲授西方理论的经济学，也有讲授《资本论》的“经济原论”，学生无论选哪一门都可以。此外，同一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学生不喜欢今年的老师，那么可以等到下一年再选修。

选修课我读得比较轻松，成绩也不错；选择必修课中我读得最苦的是计量经济学，虽然成绩是“优”，但这 4 个学分确实拿得艰辛。我所有课程中成绩最差的是必修课中的一门体育理论，仅为“可”（即“及格”）。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必修课无疑最重要，但课程设置却往往不尽如人意。那时学生们对体育课意见最大。学校规定第一学年必须修完 4 门体育课，每学期 1 门体育实技、1 门体育理论，每周各两个课时。可笑的是，每门体育课竟然只有 1 个学分，这在学校设置的课程中可谓绝无仅有。

体育实技就是让学生们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教师根据出席情况给分。我的两门实技课分别是棒球和乒乓。我对于棒球完全是门外汉，连起码的规则都一窍不通，可学校根据学号分班，我也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一棒将球击出去很远，老师只能默不作声地跑去捡回来了。上乒乓球课的时候我颇有点“黔之驴”的味道，起初日本同学觉得我既然是中国人，乒乓球就一定很“上手”（日语，表示“好”的意思），因此不大敢和我打。一来二去后，他们看出我的球技其实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差，便不大把我放在眼里了。结果这两门课我居然都得了“优”。与实技不同，体育理论课是坐而论道的。内容味同嚼蜡不说，还既要看出席率，又得考试，辛辛苦苦一学期，最后只得 1 分，因此势必引起大家“公愤”。任课老师对学生们的心态了如指掌，但反应各不相同。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儿玉先生就“冒天下之大不韪”，让学生们饱尝滋味。体育理论是有一百多人上的大课，一般大课不点名，但儿玉先生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发下一百多张“授业票”，课后再如数回收；他将自己的著书作为课堂教材，劝学生们购买，称考试内容都在书里，结果不少人果真买了，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翻了一下，发现儿玉先生的著作更像一本生理卫生教材，而他在上课时几乎完全不按照教材讲课。有一次他说中国人体育比日本人强的原因在于中国菜的油多，中国人从小吃大量的油水长大，身体素质自然比日本人强，话音未落即引起了在座中国留学生的哄笑。比哄笑更让他生气的是开小差，认真听课的几乎没有。由于开小差的人太多，法不责众，儿玉先生做不到像文学课老师那样当场发飚，他只有等到考试的时候才能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学生。临近期末的时候，儿玉先生宣布将进行闭卷考试，复习范围就是那本书，这已经给了学生们当头一棒。考卷发下来后，大家只觉得头胀：又是选择题，又是计算题，又是论述题，还加一篇小论文。当考试成绩在张贴栏公布后，大家吃惊地看到在“不可”（即“不及格”）一栏里竟然列着二十来个学号。必修课开了红灯是件很麻烦的事，必须重修，直到及格为止，否则不能毕业。为了 1 个学分，二十来个学生不得不两次看儿玉先生的脸色，是否有人看过他 3 次脸色，我就知道了。

## 四 同学之间

这里主要叙述发生在留学生之间的故事。在本科生阶段，外国留学生若非某学生社团的活跃份子，一般无缘与日本同学之间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据我的观察，即便是日本学生之间，也罕有通过课堂成为好朋友的。外国留学生通常不参加各种学生社团，有的即便加入了，

也难免虎头蛇尾的结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主要是经济问题，其次与日本人的性情有关。

就读于关东学院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绝大多数为来自于东亚地区的自费生，经济状况普遍比较窘迫。对于他们而言，打工的重要性仅次于学习；而参加社团活动除了耗费时间外，还得自己贴钱，因此令大多数留学生望而却步。此外，即便对于极少数有钱、有闲、而且还有心加入学生社团的留学生来说，也很难与社团内的氛围融合，容易被边缘化。问题倒并不在于日本学生有意排外，而是彼此间的差距让双方都觉得不自在。普通日本学生既非国际主义者，亦非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外国留学生本身已属“另类”，而且有些话跟对方既说不明白，也解释不清。既然如此，敬而远之总不失为上策。只是这样一来，使留学生顿感落寞，也容易招致误解。

虽说与日本同学走得比较远，但留学生彼此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密。这种关系是留学生们在相同处境下形成的，互相帮助中夹杂着勾心斗角，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亲密。1992年4月我入学时，关东学院大学的留学生总数尚不足150名（此后数年间急剧上升，1997年前后达到最高峰，约300人），包括分布于各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国大陆学生约占留学生总数的60%，人数最多；第二位是来自台湾地区的留学生，约占总数的20%；韩国学生与马来西亚学生的人数差不多，分别占据第三、第四位，其中马来西亚留学生都是华人子弟；其余留学生分别来自越南、缅甸、孟加拉、印度，人数很少。此外，学校里还有来自英美的交换留学生，他们在校时间较短（一般为数月），显得特立独行。

中国大陆、台湾，加上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构成了留学生的主体，每逢留学生举行活动时，说中文的学生基本上包揽了大小事情。学校有一个留学生自治团体——“留学生同好会”，实际是由校方设立的，并得到自治体以及国家教育行政单位的资助。这个类似于学生会的组织虽从不强求留学生参加活动，但由于掌握着一部分经费和机会，加之可以优先获知奖学金的信息，因此也属“兵家必争之地”。华人学生既占多数，把持“同好会”也是必然之事。会长、干事之类的职位就由大陆、台湾学生“瓜分”了。这种情况引起了韩国留学生的不满，他们指出学校拨给留学生的资源和机会理应人人均等，现在中国大陆、台湾学生操纵着“同好会”，马来西亚学生跟着“利益均沾”，韩国人就没了出头之日。学校分管留学生事务的一些教职员从管理的角度出发，也不希望看到华人独大的局面，因此在暗中给韩国人打气。

但韩国学生的努力最终落了空。原因再简单不过：势单力孤。“留学生同好会”的“学生干部”是由留学生们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韩国人无论怎样不满，都不可能选举中占上风。而分管老师即便对选举情况再有想法，也从来都是接受既成事实，不会去设法插手、操纵选举。他们给与韩国学生的只能是一些精神鼓励和安慰。眼看无法扭转局面，韩国学生便转而实行抵制，不参加“同好会”举办的任何活动，这一招的效果适得其反：其他留学生对此毫不在乎，反而得罪了不希望学生之间公开闹意见的分管老师。

虽然韩国同学对华人学生在留学生社团中占据优势表示不服，但个人之间交往时还是很客气的。比如我曾经和一位经营学部的韩国留学生一起选修过一个讲座，除了我们两人外，其余都是日本学生。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和那位韩国朋友之间也没什么特别的交情，但每次上课见面时总得打个招呼，寒暄两句。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的缘故吧。

作为两个群体而言，中国大陆与台湾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1990年以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人数远高于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在许多日本的大学校园内，台湾人是风头最健的留学生群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不少台湾学生认为自己的言行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所以于行为举止方面比较注意。1990年以后，大陆留学生大批来日，很快就成为外国留学生中最大的一群，“颠覆”了台湾学生在许多大学留学生社团中的领导地位。以关东学院大学为例，“留学生同好会”创建于80年代中叶，1992年以前的历任会长、骨干分子都是台湾人。从1992年起，大陆留学生的人数开始大增，当年举行的“同好会”选举中，台湾籍

的会长和干事全部落选，改由大陆学生担任。在以后的数届“同好会”中，台湾同学虽然也担任一些其他职务，但会长却始终由大陆学生担任。对这种情况，多数台湾同学是不满意的。

造成双方隔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少台湾学生感到在经济上遭受大陆的打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台断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向台湾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之类的资助，这就对台湾学生的经济状况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在大陆留学生比较稀少的年代，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资助还比较容易；而现在则困难多了。就我身边的那些台湾同学而言，虽然有的家境比较富裕、可以负担高昂的学费与生活费；但多数为寻常人家出身，仅靠家庭的资助是比较吃力的。实际上，课余打工的台湾留学生不在少数。原本大家都不容易，但一些台湾同学却将自己遭受的艰辛归咎于大陆同学，这在我看来实在有失公正。

此外，虽然海峡两岸同为中国人，但长期的阻断使双方在性情、习惯、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彼此都很有些看不惯对方。在我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台湾同学有一阵对大陆同学意见很大，指责对方“霸道”，扬言要与韩国同学一起另组织一个学生会，与大陆学生占主体的“同好会”一刀两断。虽然有一些老师在感情上比较倾向于台湾同学，但校方不愿意看到事情闹僵，出面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大家的关系才逐渐有所缓和。

相对而言，中国大陆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最复杂的。这是因为大家的处境、诉求基本相同、而机会却不可能人人均沾的缘故。大家一方面互相帮助，然而在机遇降临之际也会耍些小手腕。尤其在一些重要的奖学金名额面前，同学间的情谊往往会变得很脆弱。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奖学金莫过于文部省颁发的“国费”奖学金。这项奖学金待遇优厚：除免除学费外，还按照日本的标准提供足额生活费；此外另有每年用于在日本国内考察的经费及回国探亲的旅费。“国费”奖学金的名额按照留学生人数的多寡产生，关东学院大学一般是两名。虽然“国费”奖学金名义上是由文部省根据申请人的学习成绩加以决定，但实际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学校分管留学生事务的老师。因为留学生只有通过学校才能提出申请，而且还得先由校方进行初审，而整个过程并不透明。在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下，与老师关系好的同学总是最有机会获得，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但在我毕业那年，却因为“国费”奖学金的人选问题闹了一场风波。

1995年，文部省给了关东学院大学本科4年级的外国留学生一个“国费”奖学金名额，成绩优秀、且毕业后有志于深造者优先考虑。从3月份开始申请，一直到10月底校方还未公布最终获得奖学金的人选。眼看明年3月份就要毕业了，那个“幸运儿”已经不声不响地领取了大半年的“国费”奖学金，大家却仍不识其“庐山真面目”。一些申请者到分管老师那里去问个究竟，谜底方才揭晓，原来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经济学部留学生获得了“国费”奖学金。消息一传开就犹如炸了锅一般，群情激愤，尤以经济学部和工学部的大陆留学生为甚。其他学部的留学生至多只是对校方迟迟不公开人选表示不满、怀疑其中有猫腻；而经济学部、工学部的大陆留学生却已是“义愤填膺”了。这倒也情有可原：工学部的学费比较高，课程也比较难，重大奖学金历来是向其倾斜的；经济学部的同学感到气愤则是因为他们认为此人成绩并不算最好，之所以拿到“国费”纯粹是拍老师马屁的结果。

我和这位幸运的同学从语言学校时代起就是朋友了。我们既是同乡，年纪也一样；我们还都曾在对方找不到工作时伸出过援手，将其介绍到自己打工的地方，“有饭同吃”。这种关系大概也算得上是患难之交了。我曾经当面问过他是否已经获奖，得到的回答是断然否认。现在真相大白，彼此不免有些尴尬。当经济学部的其他两位上海同学找到我，要我和大家一起联名向校长反映这件事的时候，我当即表示拒绝。我告诉他们，这样做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位同学的成绩的确比较优秀。虽然他确实不算最优秀，但也没有一个人的成绩是大家公认为最优秀的。其次，和老师关系融洽是好事，不能算作一条“罪名”。听了我的话后，两人没说什么，也没再勉强我。但一些留学生还是向校长提出了申诉，严厉指责分管老师和那位上海同学，要求重新评定“国费”奖学金的人选。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4年的留学生活，使我掌握了专业知识，增长了见闻，丰富了社会阅历。现在回顾这段往事，一方面不禁感慨岁月无情，同时再次深切体会到留学对我人生产生的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葛涛，副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